

# 调节焦点模式动机剖面：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

彭香丽

山东财经大学

DOI:10.12238/mef.v8i11.14827

**[摘要]** 调节焦点/模式剖面通过整合Higgins(2012)动机理论和二语动机理论,为研究外语动机提供了新框架。本文梳理Higgins(2012)理论基础,综述近十年剖面实证研究的范式、方法与发现,指出现有研究在理论整合、方法论上的局限,并从整合动机理论、动机剖面分析研究、干预策略三方面展望未来方向。

**[关键词]** Higgins理论; 动机剖面; 潜在剖面分析; 二语动机

**中图分类号:** D08 **文献标识码:** A

## Regulatory Focus-mode Profiles: Research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

Xiangli Peng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Investigating regulatory focus/mode profiles provides a new framework for studying foreign language motivation by integrating Higgins(2012) motivation theory and second language motivation theori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Higgins (2012), summarizes the paradigms, methods and findings of cross-sectional empirical research in recent ten years, points out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research in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methodology,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direction from three aspects: integration of motivation theories, motivation profile analysis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Key words]** Higgins' theory of motivation; Motive profile;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Second language motivation

### 引言

在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二语动机交叉发展的背景下,学习者动机研究正从单一变量分析转向系统整合视角。调节焦点调节模式剖面研究通过整合 Higgins (2012) 提出的促进、预防、行动、评估动机系统,结合潜在剖面分析方法,为揭示动机维度交互作用提供了框架。近十年间,调节焦点-调节模式剖面研究已在教育心理学取得丰富成果,但外语动机研究领域刚刚起步。本文旨在厘清理论脉络,综述研究现状,并展望未来发展方向,为构建二语动机剖面研究提供参考。

### 1 Higgins动机系统

动机是人们在实现目标过程中追求有效性,做出的自我调节选择。自我调节是个体主动调整自身行为,包括设定目标、监控过程并灵活运用策略,最终实现预期结果。Higgins(2012)动机理论包括调节焦点两个系统(促进、预防)和调节模式两个系统(行动、评估)。这四个系统都是目标实现过程中的动机系统,代表了人们在追求有效性过程中,不同的偏好和选择,形成或者影响不同的动机行为、认知策略、情绪体验<sup>[1]</sup>。

Higgins(2012)调节焦点系统包括促进和预防动机。促进是聚焦希望和抱负,追求发展,强调收益与否,采取利益最大化和

避免失利的渴望策略,侧重速度和变化。预防聚焦责任和义务,追求安全和稳定,强调损失与否,从而采取保证不赔和避免损失的警惕策略,侧重准确性和维持现状。调节模式系统包括评估与行动两种模式,自我调节目标追求的有效性。具体而言,评估反映真假对错(求真性),侧重各种目标及有效策略的比较和选择,更注重准确性而非速度,与外部动机相关。而行动则是反映控制有效性,追求改变现状,执行既定目标和策略,更注重选择速度,与内在动机和自主型动机相关(Hattie等,2020)<sup>[2]</sup>。研究调节定向与模式导向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助于深化对动机效应机理的认识。

### 2 剖面分析实证研究现状

#### 2.1 剖面分析实证研究现状

在动机研究领域,近30年以来对调节焦点(Higgins,1997)和调节模式(Kruglanski等,2000)与动机(认知)、情绪体验及行为的关联研究比较成熟。这些研究以探究调节焦点或者调节模式作为变量与其他变量的关系,采用变量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如回归分析)。这些研究包括调查美国本科生、意大利高中生、瑞典本科生,围绕调节模式和自我决定理论中的动机类型(如内在动机、自主型动机、受控型动机等)的相关关系(Hodis,2018)<sup>[3]</sup>。

这些动机在语言学习起着关键作用。如促进导向与学生对新西兰中学生英语学习成功预期成显著性正相关,而预防导向的相关性较为有限;促进与自主和受控型动机均呈现显著正相关,预防与自主型动机无显著性相关,而在受控型动机上则呈现轻微负相关;行动导向在两种动机中均显著正相关,而评估的显著正相关性较弱(Hodis, 2018)。

## 2.2 以人为中心式研究

与以往基于变量为中心的研究不同,我们将探究用潜在剖面分析促进、预防、评估和行动导向之间相互关系,聚焦外语学习这一特定领域,以中国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并识别针对这个群体中不同的潜在的调节焦点-模式剖面,揭示了不同剖面特征和本质;探讨这些剖面与动机相关变量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动机剖面有利于揭示这四种动机系统如何共同作用及其效应,尤其有助于理解在中国大学生外语学习背景下,研究促进、预防、评估和行动导向的不同的组合类型。

我们通过梳理基于现有的剖面分析Higgins(2012)动机研究文献,发现四篇相关文章,代表四种不同的研究类型。尽管调节焦点-模式剖面对研究动机意义重大,但是相关研究,尤其是中国大学生调节焦点模式剖面研究刚刚起步。

第一类研究围绕四因子(促进、预防、行动、评估)剖面模型+结果变量。如Gao等(2022)采用潜在剖面法分析中国886名本科生,发现五个潜在群体组(剖面):四动机都高组(C1),三中动机+低预防组(C2),三高动机+低预防组(C3),三低动机+中下预防组(C4),四中下指标组(C5)。识别这五种动机剖面有利于揭示四个动机之间相互关系。该研究还分析了不同剖面 and 学业成功相关因素(如毅力)的差异关系。例如,C1组与最优的学业表现相关,而C4则表现最差<sup>[4]</sup>。

四因子(促进、预防、行动、评估)剖面模型对研究中国外语学习者(如大学生英语学习群体)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对象有重要启示意义。研究内容为调查学生的动机(Higgins的四维动机),采用LPA研究方法,来识别剖面组合类型和性质,再比较这些剖面在英语学习相关动机变量(作为结果变量)是否有显著差异。

第二类为二因子(促进+预防,或者行动+评估)+其他因子(变量)剖面模型+结果变量。Hodis&Hodis(2025)调查了307名美国本科生,考查促进、预防和注意力管理为因子的潜在剖面类型,并检验潜在群体在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和挫败感方面的差异<sup>[5]</sup>。潜在剖面分析确定了三种潜在群体:中促进、高预防和高定向注意水平的学生组(C1),三低组(C2),三高组(C3)。在比较心理基本需求方面显著差异,C1组最具适应性,其心理需求的满足感强而挫败感弱;C2组最具不适应性,其心理需求的挫败感强而满足感弱<sup>[5]</sup>。

研究者可用调节焦点或者调节模式作为基本的二因子,结果比较变量可以像Hodis&Hodis(2025)采用的自我决定理论中的基本心理需求。这样会有多种不同模型的组合研究设计来探讨调节焦点(或者调节模式)加上其他变量(一项或者多项)作为剖

面模型的因子,以及这些剖面类型和结果变量的显著差异关系。

第三类为预测变量+二因子(促进+预防,或者行动+评估)剖面模型+结果变量。Liu&Yao(2019)调查了中国3983名中国中小学生,考查促进、预防为因子的潜在剖面,并检验潜在学生群体在预测变量(五大人格,如责任心、开放性、神经质等)和结果变量(自尊、孤独感、生活满意度)的差异。潜在剖面分析(LPA)确定了四种潜在群体:二高组(C1),二中组(C2),二低组(C3),高促进、低预防(C4)<sup>[6]</sup>。

研究者可用调节焦点或者调节模式作为基本的二因子,结果变量还是采用上面四类结果变量。这样调节焦点(或者调节模式)二因子剖面模型,加上多种不同预测变量和结果变量的组合研究设计。重要的是,上面的两种研究设计类型(研究类型1和2)也可以加上预测变量,这样研究设计组合更多元化。

第四类为二因子(L2促进+预防,或者L2行动+评估)剖面模型+结果变量。Teimouri等(2022)调查了918名伊朗英语学习者,考查外语学习行动、评估为因子的二语学习者自我调节模式的动机组合类型,并检验潜在学生群体在动机、情绪体验和语言水平等结果变量(如语言学习投入度、课堂参与意愿、专注度、愉悦感、自我感知语言水平)的差异。通过聚类分析,发现四种动机组合类型。二高组(C1),高评估、低行动学生组(C2),低评估、高行动学生组(C3),二低组(C4)。在比较结果变量上显著差异,C4组与高动机、自我感知语言水平、愉悦感显著相关,与低二语焦虑显著相关。C1组与低动机、愉悦感、焦虑显著相关,但与高自我感知语言水平显著相关。C2与C3组学生相比,语言学习投入度无显著差异,在二语焦虑上C2组比C3组高,C3组在其他结果变量上高于C2组<sup>[7]</sup>。

Teimouri等(2022)研究是Higgins调节模式动机理论目前在二语动机研究的首项动机组合类型研究(尽管是聚类分析而不是潜在剖面分析),研究模型设计的研究内容包括调节模式两个动机,这项研究设计为外语学习动机潜在剖面研究有如下启示。研究者可用L2调节焦点或者L2调节模式作为基本的二因子,再从上面前三类结果变量选择一项或者几项变量作为剖面模型的预测变量。结果变量还是采用上面四类结果变量。这样L2调节焦点(或者调节模式)二因子剖面模型,加上多种不同预测变量和结果变量的组合研究设计。重要的是,上面的两种研究设计类型(研究类型1和2)也可以加上预测变量,这样研究设计组合更多元化。

## 3 未来研究方向

随着调节焦点与调节模式理论在教育心理学广泛应用和最近引入到二语动机,为二语学习动机研究注入新的理论范式<sup>[7]</sup>。

尽管已有研究显示中国、美国、新西兰学生在动机剖面结构上存在某些一致性(如高适应型),但不同文化背景下各动机剖面组合存在显著差异。为更全面理解二语学习者动机的异质性,未来研究可整合动机维度(促进、预防、评估、行动)、价值观(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情境变量(如人工智能环境)等要素,以解释动机剖面的跨文化性。

Higgins动机理论亦可与其他动机理论(自我决定理论等)相结合,探讨其在动机剖面与这些理论中的动机因素关系。例如,高促进+高行动剖面可能与自主性与胜任感的满足相关,而高预防+高评估型剖面可能与挫败感相关。这些研究将有助于理论整合和构建新的动机模型。根据不同动机剖面,教师可以设计差异化的任务与反馈策略,实现个性化支持。

#### 4 结论

本文提出的“调节焦点调节模式动机剖面”研究框架,通过整合多种动机理论并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为中国外语学习动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这种多维度的动机剖面分析有助于揭示了动机的复杂机制,还有助于教师在适应中国文化环境下的有效干预策略。

#### [参考文献]

- [1] Higgins, E. T. (2012). *Beyond pleasure and pain: How motivation works*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 Hattie, J., Hodis, F. A., & Kang, S. H. (2020). Theories of motivation: Integration and ways forward [J].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61, 101865.
- [3] Hodis, F. A. (2018). Examining individuals' strivings for value, control, and truth effectiveness: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30, 1001-1030.

[4] Gao, J., Hodis, F. A., & Tait, C. F. (2022). University students' regulatory focus-mode profil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grit, critical thinking, effort regulation, and perceptions of academic success [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89, 111474.

[5] Hodis, F. A., & Hodis, G. M. (2025). Configurations of regulatory focus and directing attention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autonomy, competence, and relatedness need satisfaction/frustration [J]. *Educational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ist*, 42(1), 22-36.

[6] Liu, H., & Yao, M. (2019). Regulatory focus profiles among Chinese pre-adolescents and adolescen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personality and psychological outcomes [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 1807-1824.

[7] Teimouri, Y., Papi, M., & Tahmouresi, S. (2022).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how language learners pursue goals: Regulatory mode perspective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44(3), 633-658.

#### 作者简介:

彭香丽(1979--),女,汉族,山东省郓城人,山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